

■新作聚焦

葛水平《和平》: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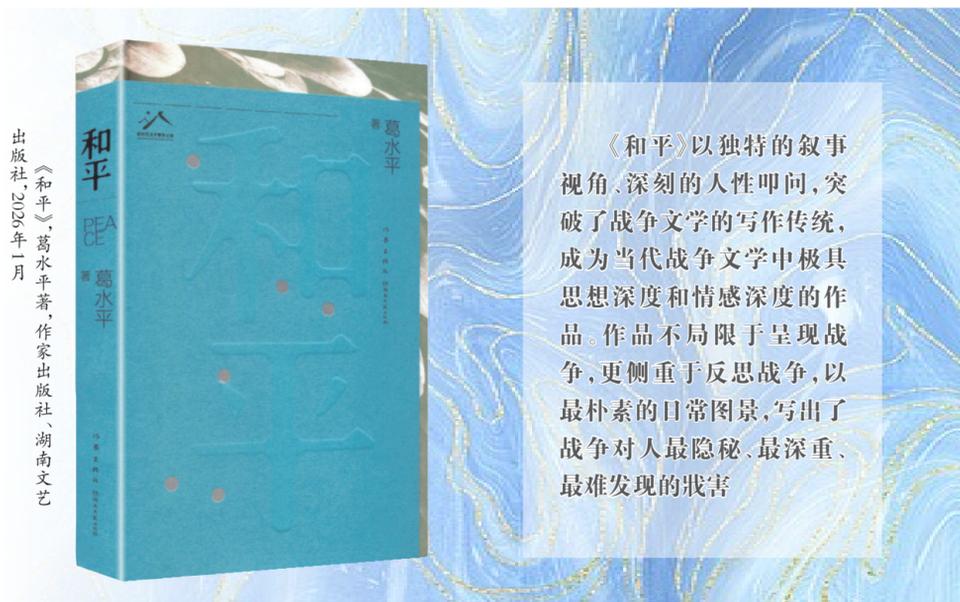
最深重的苦难是看不见的

□孟繁华

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硝烟已经散尽,但战争留下的创伤记忆并没有随风飘散;更令人担忧的是,世界上局部战争一直没有停止。因此,文学在呈现或还原战争场景的同时,更需要在深层意义上反省和检讨战争给人类带来的巨大灾难。世界文学中有很多这样的作品,比如海明威《永别了,武器》、萨特《死无葬身之地》、考琳·魏格纳《纪念碑》、肖洛霍夫《一个人的遭遇》、瓦西里耶夫《这里的黎明静悄悄》、徐怀中《西线无战事》、邓一光的《人,或所有的士兵》等。这些作品告诉我们,和平生活的珍贵就体现在波澜不惊的寻常日子里,我们习焉不察的日常生活珍贵,是怎样在战争状态下幻灭、破碎和万劫不复的。另一方面,战争给世界带来了绝望,但那绝望的灰烬里也燃烧着永不熄灭的正义和尊严,那是对和平的永恒祈愿。这也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小说一直没有中断的潮流和趋向。

葛水平的长篇小说《和平》,就在这样的战争小说的整体潮流中。在中国的语境里,我们也可以认为这是一部重新书写战争的小说,是一部居安思危的小说,是一部侵略者的忏悔录,更是一部深度勘探人性的小说。小说最重要的价值,是发现了战争制造的最深重的苦难——那是一种看不见的苦难。能够看见的苦难,可以诉说,有人同情;看不见的苦难则无处诉说,无从被人理解,是一种被世界静音、屏蔽的,最彻底、最无解的苦难。这是小说最大的发现。作品以独特的叙事视角、深刻的人性叩问,突破了战争文学的写作传统,成为当代战争文学中极具思想深度和情感深度的作品。《和平》是一部战争小说,不同的是,小说没有直接写正面战场的刀光剑影血流成河,而是将战争从正面战场置换为日常灾难,以寻常日子的破碎,书写战争最本质的残酷。小说没有炮火连天,没有肉搏厮杀,只有战争笼罩下普通人的流离失所、苟延残喘的绝望,这是看得见的离乱流亡。小说的与众不同,是写了那些“看不见”的苦难,那是战争带来的最沉重的精神和心灵的苦难。张子民的一生,是被苦难不断剥夺的一生。1910年东北大旱疫,他从死人堆里被盲人养父救出。养父留下一句“多说人好,穷人不能有穷相”,便在一次外出算命时失足跌落山崖而亡。他被大伯卖到钟表店,在钟表店主王向阳的帮助下,他进入奉天邮政局成为一名职员。然而战争的到来,让一切再次崩塌。从奉天到潼关,从潼关到宝鸡,张子民带着家人在流亡路上颠沛辗转。但比肉体的流离更可怕的,是内心的颓败和荒凉。那些在战争中死去的人,包括他的女儿张若蕙,他再也见不到他们。这是“看不见的苦难”最切近的写照。如果说张子民的绝望是“失去”带来的苍凉,那么绿萍的屈辱则是被侵犯带来的终生不能释怀的耻辱。绿萍是钟表店主王向阳的女儿,与张子民一同在教会学校读书,她本可以拥有另一种人生,但战争爆发彻底改变了她的命运。一方面是战争带来的苦难,另一方面是弱势性别不能逃脱的宿命。绿萍的屈辱,藏在那些没有被写出的细节里。当张子民凭借读书改变命运,她却因为“替父亲经营事业”而被剥夺了受教育的权利,她的隐忍被视为理所当然,她们的付出被认为是天经地义,她们的屈辱则被淹没在历史大叙事中。绿萍被八木下弘侵犯,是难以言说的、只能自己吞咽的屈辱。别人看不见的事情,只有自己去默默承受。小说中最深重的看不见的苦难,集中体现在绿萍身上。

八木下弘的故事是《和平》中最具伦理张力的部分。这个来自日本北海道小樽的青年,与张子民“同年同月同日”出生,生肖属虎”。两个在同一天、同一时辰出生的人,却因战争而壁垒分明。八木下弘的童年浸润在中国文化中。他深爱绿萍,却在归国参战前,粗暴地侵犯了绿萍。这是小说转折的关键。作为随军记者来到中国,八木下弘目睹并参与日军的种种暴行后,灵魂开始撕裂忏悔。八木下弘的忏悔,是最典型的看不见的苦难之一。他的罪行已



《和平》,葛水平著,作家出版社、湖南文艺出版社,2025年1月

经铸成,无法挽回;他的忏悔无法改变历史,甚至无法被受害者接受。在临终前的幻觉中,他感到“身体几近分裂,仿佛有无数细小的尖刺在凿空他”。战争对于他而言,是“斩断流水一样斩断了那些鲜活的声音和影子”。张子民的绝望、绿萍的屈辱、八木下弘的忏悔,构成了小说“看不见的灾难”的三种不同形态。这种苦难之所以深重,是因为它无处诉说,让人失去现实感,处在永无出头之日的困境里不能自拔,它荒芜如大漠,黑暗如深渊,那是另外一个万劫不复的世界。更致命的是,这种绝望感无人知晓,永难治愈。

作品通过对看不见的苦难的描摹,告诉人们,战争的正面战场,后方的黎民百姓都是战争的受害者。战争告诫人们,和平并非如影随形,它需要所有人共同维护,应该成为人类共同的价值目标。法国作家、政治活动家安德烈·马尔罗在反思两次世界大战与冷战阴影下的和平时说过,我们的和平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脆弱。他亲历了西班牙内战、二战,深知和平不是自然天成,它需要持久地捍卫。因为世界的平衡是脆弱的,它能轻而易举地被仇恨、野心与遗忘冲破。马尔罗的洞见在今天依然适用。和平之所以脆弱,是因为和平本身是一种非自然状态,需要付出巨大的代价才能维持,而冲突的导火索如资源争夺等则从未消失。同时,全球化和网络战也让和平更加易碎、更加珍贵,和平时期充斥着看不见硝烟的战争。正因如此,葛水平在《和平》中所说的“在这个脆弱的世界上,最坚硬的东西只能是正义与和平,不能是武器”,是在绝望的灰烬中闪烁的正义之光。

战争文学的价值不仅在于再现暴力的规模和惨烈,也在于挖掘暴力对人的异化和摧毁。葛水平的《和平》正是沿着这一精神脉络,不局限于呈现战争,而是更侧重于反思战争,以最朴素的日常图景,写出战争对人最隐秘、最深重也最难以发现的致命戕害,这也是重写战争最具思想价值的方面。战争在文本中不是历史事件,而是对日常秩序的碾碎;不是军事对抗,而是普通人生命权利的被剥夺。葛水平不展示暴力场面,不描写死亡,却让“最深重的看不见的灾难”跟小说全过程。小说平静克制的叙事,远比战场厮杀更具悲剧性。

《和平》以独特的叙事视角、深刻的人性叩问,突破了战争文学的写作传统,成为当代战争文学中极具思想深度和情感深度的作品。作品不局限于呈现战争,更侧重于反思战争,以最朴素的日常图景,写出了战争对人最隐秘、最深重、最难发现的戕害

葛水平在后记《只有时间是忠诚的》里引用了吉尔吉斯斯坦作家艾特马托夫在《白轮船》中借外公莫蒙唱的古老的歌谣:“有没有比你更宽阔的河流?艾涅塞;有没有比你更亲切的土地?艾涅塞;有没有比你更自由的意志?艾涅塞。”读者也许会感到突兀,为什么在讨论小说《和平》时提到了吉尔吉斯斯坦的古老歌谣?如果我们理解了这首歌谣的要义,也就明白了作家的心理。民歌《艾涅塞》是《白轮船》的精神母题,它以中亚古老河流的名义,为孩子的纯真与族群的命运设下祭坛,既是文明起源的记忆,也是精神信仰的象征,更是悲剧终局的挽歌。外公通过教唱这首民歌,将仁爱、敬畏自然与坚守良知的价值观传递给孩子。歌中“有没有比你更亲切的土地”的追问,构成了孩子的精神世界。这一文明坚守的不只是个人的纯真,更是整个民族尚未被现代文明侵蚀的原初精神。葛水平提到《艾涅塞》,是一种借用和类比:中华民族对和平的祈祷、热爱和维护,正如《艾涅塞》所歌唱的那样深入而持久,这是一种不可磨灭的信念,是绝望灰烬里不灭的光。

葛水平常年行走,徜徉于晋东南广阔的田野和沁水太行,她笔下的山山水水、蓝天白云,如诗如画,与其说这是对自然的亲近或文人的趣味,毋宁说是对和平生活,对宁静祥和日子由衷的热爱、欣赏和迷恋。她内心深处未必有对和平生活失去的恐慌和不安,但也也许唯有如此才会表达对和平生活的敬意和祈祷。因此,《和平》是一部写在战争背面的平民控诉书,是参与战事侵略者的忏悔录,是战争受害者绝望的证词,也是一个和平主义者发自内心的对和平的珍惜和祈愿。

看不见的创伤无处不在。它在张子民惶惶的流亡路上,在绿萍难以洗刷的屈辱中,也在八木下弘深渊般的忏悔里。我们在《和平》中读到了过去战争小说少有的另一种悲剧和绝望,因此,其背后对和平的祈求和祈愿才如此感天撼地。

(作者系沈阳师范大学特聘教授)

■创作谈

没有一个人是为了战争而出生。战争把一切温暖的事物变得黑暗和悲伤。如果说现实社会中一个人的死亡是一个悲剧,那么战争中3500多万伤亡者只是一个数字。长达14年的抗日战争,9500多万平民流离失所。庞大数字的震撼力永远建立在“一”的基础上,《和平》也是在一个中国人与一个日本人的基础上讲故事。

所有的文学作品都有原型。写作的起因是我婆婆家族的故事感染了我。婆婆的父亲是一名东北邮政工作者,九一八事变之后,奉天沦陷,但有骨气的奉天邮务管理局始终坚持“中华邮政”,拒绝与日本人合作。战争爆发后,奉天邮务管理局全部职员撤入山海关内,正如《和平》中所描述:“千里流亡,共赴国难,在这期间,中国人要多生娃娃,不为什么就为了自己的国家将来有扛枪打仗的人!”婆婆在讲这段故事时,我泪流满面。了解愈深,战争中横冲直撞的恐惧、无辜生命凋零的悚然,便愈发沉痛地压在心头。时间或许会风化记忆,人性中最顽强的,却终究会留存下来。

写作期间,我曾经三次到山西的风陵渡,然后过黄河去潼关,两次去府谷,两次去榆林,一次去宝鸡,一次去贵州镇远古镇考察“和平”村日军战犯所,并且多次求助在榆林政协的作家朋友王馨。

我的另一位画家朋友金小民,给我讲述战争中当地老百姓从地下刨出石碑,上面刻着“我死国活”。两度搁笔,不是不敢写,而是历史太过沉重,我生怕轻薄的文字,辜负了那些以命换国的灵魂。婆婆兄弟姐妹9个,5个参军。她的父亲一生留下大量的日记,每一本日记封皮的绸面上都绣着“和平”二字。可惜后来日记在颠沛流离中遗失了。写作期间,我大量查阅日军战犯写下的战争回忆录,其中记录日本人对中国的窥探很早,从日本明治维新后就派特务进入中国,手绘中国地图,为占领做准备。

岁月从不同等于时间,前者是鲜活的过往,后者是冰冷的刻度;时代也绝非历史的反义词,而是历史在当下的延续。太多普通百姓并非漠然世事,只是被恐惧裹挟;比起在绝境中挣扎求生的能力,他们甚至连预判战争降临的力量,都显得格外微弱。而活下去的唯一方式,便是“迎接”——像迎接每一个明天到来那样,接纳眼前的苦难。

为生存倾注热情,是刻在人性里的本能。写作者的情感终有限度,而这限度,说到底就是爱的能力的限度。我爱着笔下每一个角色——只因为,他们都活在那样艰难的战争年代里。创作途中,我曾两度停滞。初动笔时的满腔壮志,在写到十万字、触及战争题材时骤然碰壁——我的知识储备清晰地告诉我,自己正踏入一片全然陌生的领域。被感动是一回事,要将这份震颤妥帖地转化为文字,更是另一重艰难的考验。《和平》中的钟表是时间的具象化,它寓意时间作为第四维度的存在——每秒跳动的格数、永远均匀的节奏,都在丈量着不可逆转的进程。可在这规整的时德里,有多少人悄然消失?他们来过这世间,却从未尝过好日子滋味,人类的挣扎与悲欢,终究显得毫无理性。

人间烟火如一根细密的针,串联起时代的肌理。在《和平》中,我只想借民间那些鲜活有趣的现象,让读者触碰到那个时代的面容与神情。陈年往事与尘上旧梦,宛如一条流动不居却澄澈明净的河——它承载着小说人物的生命历程与心路轨迹,亦是战争里卑微个体头顶那片难得的蓝天白云。而在民间土壤里,随处可见的神秘角落,如同故事枝干上吊挂的细碎花叶,繁复却生动。我希望对这段过往既感兴趣又知之甚少的读者,能透过这些历史的细微表情与岁月深处的真切面容,读出那时的人间模样。

我在《和平》中写中国女性和日本女性,她们被战争伤害。我一直苦于难以从内心寻找到可以与战争年代相称的感情。对于她们身体中发生的任何奇妙变化,我必须本着符合人性的原则,不带任何情绪去书写。当我们剥离战争的宏大叙事,回归个体本身,这些曾承受深重屈辱与牺牲的女性,也理应得到尊重——这份尊重,值得女性创作者用文字去珍视、去守护,为她们被忽略的苦难与尊严留下印记。

2025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。那一段并不遥远的过往:家国飘摇,山河遭难,而彼时黄土地上扎根生长的草木,恰似绝境中不屈的脊梁,以蓬勃的生命力昭示着民族的韧性。

面对任何国家的战争,我们都不应该轻慢了生命。让我们永远记住:这场战事,承接过去,也指向未来。

■短评

旧时风物与多情

——评孟昭旺长篇小说《北乡谣》

□邢建昌

青年作家孟昭旺的长篇小说《北乡谣》是这些年来农村题材乡土叙事难得的佳作。20世纪80年代的董村,已经进入改革开放的新时期,但处处弥漫着“旧日的气息”。这既是小说叙事的起点,也是小说围绕人物展开铺陈的基调。

学界认为,作者受先锋小说影响,偏爱少年视角与成长叙事,这一创作特征在他的早期作品中的确有清晰体现。其作品《秋天的故事》中对成长主题的刻意雕琢依然可见。《北乡谣》与他此前的创作形成了鲜明分野。如果说他前期小说的创作风格尚显模糊、辨识度不足,那么这部作品则鲜明彰显出独属于作者的标识化特质。而这—核心特质,我将其概括为古典性,特指小说在叙事层面对中国古典小说形成的传承关系与互文呼应。譬如全书采用全知叙事视角,沿用古典小说的叙述语言,强化故事性与神性书写;同时大量化用“嘉利闻讯,惊诧不已”“众人点头称是”“来人一一答毕,握手道别”“青宁却甩开嘉利,径自走了”这类传统白话小说的语体范式,处处彰显作品与古典文学一脉相承的精神脉络。不过,《北乡谣》的古典性并非简单复古,而是作家主动的艺术创造。这种古典性既是一种叙事策略,又恰似乐曲的基调,在小说的叙事时空里始终萦绕回响。作品厚

重、舒缓且氤氲绵长的古典文化气韵,与粗粝鲜活、贴近当下的现实生存图景相互交融呼应,构筑出多声部共鸣、一咏三叹、意蕴绵长的叙事交响。

作者曾多次提及,故乡董村是其文学创作的灵感之源。深谙其创作的读者都明白,小说中的董村早已不再是现实里真实存在的村落原型。它在文本中被拆解、虚化并赋予意象内涵,成为作家拓展小说艺术可能性的独特载体。这一点不难理解:小说里的乡土生活熔铸了作者的情感寄托与文学想象,构建起专属于创作主体的“第二自然”。生活之于小说,只有被编织成有意义的形式,才具有被称为题材的美学价值。对于小说家来说,“写什么”与“怎么写”是同等重要的。但在实际创作中,“怎么写”可能更为重要。因为,“怎么写”决定了生活如何成为小说的题材内容,而不再是外在于小说的素材,叙述使题材获得了直抵人心的美学力量。这里所说的叙述是本体性的,我们不能离开叙述笼统地谈文学的思想意义和美学价值。

小说虽然采用全知视角,但叙述者的全知身份是隐含、消融在作品的叙事结构里的。由于叙述者隐身,小说里的人物、事件反而活跃起来。一旦视角打开,所有的故事、人物、场面、自然景象、心理

幻觉、梦境等便纷至沓来,各行其是,冥冥之中仿佛一切自有安排。全书55章,三有家盖房、嘉利回村、大旱、疫情、祈雨、戏台、葬礼等重要情节内容,都被镶嵌在一个散开的叙事结构里。这里有时时间与空间的交汇,有理性与非理性的缠绕,还有离形得似的浪漫。小说以叙述者隐退的方式,全景铺展了浓缩于一年时光里的董村百态。

作者放低叙事姿态,调动感官视角,直面现实生存本相,还原生活本来面貌。叙事如同低空飞行,聚焦乡民的日常起居、民俗劳作与婚丧嫁娶等微观生活图景,在细致描摹中构建独属于文本的诗性空间。这正是《北乡谣》独特的叙事智慧。那些被理性认知与概念逻辑遮蔽的生活细节,重新进入小说叙事,成为唤醒读者文化记忆的精神触媒。民风、民俗与民情交织相融,也赋予这部小说别致新颖的叙事调性:兼具诗性意蕴与神秘气质。

叙述中的温情,是小说打动人心的地方。乍看无端,寻思有味,令人愁肠百结。人物、事件、风物、民俗的描写细腻而简洁,常有神来之笔。皴擦点染之间,自成风流。可以说,《北乡谣》是一部值得细细品赏、咀嚼回味的好小说。

(作者系河北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)

写得不好不要紧,能坚持写就好

□陈朴

25年前,我在一所中专学校就读,去图书馆借书、在书店租书,也在路边书摊和大街上的书城买书。同学们在网吧打网络游戏的时候,我在看书;同学们在宿舍打扑克牌和麻将的时候,我还在看书。我看路遥、王安忆,也看韩寒、郭敬明,只是到现在却一直没有读过金庸和古龙,说来内心不免有些遗憾。时过境迁,如今偶尔在书架上看到武侠小说,心里还是会会出现一丝莫名的愧疚感。

那时候,我开始写诗。原因很简单,为了加入学校的文学社。我提交了两次申请书,第一次提交的作品是一首五言绝句打油诗,第二次换成了分行的现代诗,但都没有审核通过。虽然社长是我的乡,但我最终还是没取得社员资格,他们认为我写得还不够好。

写得不好不要紧,能坚持写就好。此后,从读那所学校的第三年开始至今,毕业、打工、参军,再打工,不管身在何方,身处什么样的环境,不管阅读的载体如何变化,写作的载体如何更新,读书和写作都成了我生活的重要部分,占据了我一定的闲暇时间,无法改变。在写了20年诗歌,写了10年诗歌评论,结识了1000多位诗友,出版了三本诗集后,有一天,我再也写不出一首自己满意的诗。这种痛苦、焦虑、无助的情况持续了半年之后,一个偶然的日子,我开始尝试写小说。

第一篇小说写了7000多字,用了5天时间。校对、修改、思考、再修改,反反复复,直到定稿,我才大舒了一口气,如卸掉了一个包袱,轻松、惬意,也可能夹带着几分自满。之后便是遭遇频频退稿。这时,我又陷入

了失落。夜里,我在阳台上望着夜空的星月,不禁想,难道自己真的不适合写小说?后来,我开始读王安忆的《小说六讲》、村上春树的《我的职业是小说家》、略萨的《给青年小说家的信》……再后来,我的第一篇小说在《北京文学》“新人自荐”栏目发表,文友们说我已成功转型,我却感觉前路漫漫,其中酸甜苦辣,唯有自知。

2023年9月,我有幸被陕西省作协推荐,被鲁迅文学院录取为第44届高研班学员。那是我第一次去北京,也见到了写作道路上的师友。与他们的交谈、交往和交流让我获益匪浅,也让我深刻意识到自己在写作方面还有很长的路要走。有相聚就有别离,那年12月的北京,寒风刺骨,在北京南站我流下的几行眼泪,落在了候车大厅的地砖上。因为这一别,来自全国30多个省、直辖市、自治区的同学们将各奔东西,回到自己的家乡,也许难以再相见。后来,我的小说又慢慢地在几家刊物上发表。有许多认真负责的编辑老师对我的小说提出了宝贵的修改意见,也鼓励我多加尝试,多加探索,对我报以期待,让我信心倍增,很受鼓舞。我想,只有你爱小说,小说才会爱你;只要坚持,就一定有收获。世间万物,文字永远不会欺骗人。唯有不忘初心,继续努力,持之以恒,坚守信仰,明天自会一片光明。

(作者系陕西省青年文学协会副主席)



创作随笔